



中共陇右工委领导下的

渭源地下斗争

中共渭源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

中共陇右工委领导下的
渭源地下斗争

中共渭源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序 言

渭源县的地下斗争，是我们亲身经历过来的。我们与渭源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现在，中共渭源县委党史办的同志，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收集了许多宝贵的史料，并编成一本著作，贡献给渭源县的年轻一代，让他们知道革命是怎么一回事，胜利是得之不易的，这也就是对我们的接班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要我们写篇序言，是义不容辞的。

但是，我们毕竟都是古稀老人了，要在短短的序言中，把渭源地下党员的艰苦奋斗，把渭源广大人民的伟大贡献，全面而又扼要地反映出来，就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也就是说，没有精力与信心把它写好。这是首先要向渭源县的广大读者表示歉意的。

当时中国共产党陇右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陇右工委）工作的面很宽，包括陇右地区的十八个县市，渭源县只是陇右工委的地下工作的一部分，但它是地下斗争比较出色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当时陇右工委的主要游击根据地。

它的出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短短的三年时间（从一九四六年冬到一九四九年秋），渭源县的地下党员从原来的一个人发展到一千多人，地下党的支部遍及全县。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根据中共

甘肃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甘肃工委）的指示，掌握了渭源县的约有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政权（乡镇长和保甲长），当时把这种政权叫作“两面政权”。同时又基本上掌握了渭源县的地方武装（自卫队），当时把这种武装叫作“两面武装”。从而为后来的和平解放渭源县城打下了基础。

二、由于我们在渭源县的地下工作打下了上述基础，陇右工委的一些重要活动，都在渭源县境内进行。下面我们只举几个突出的例子：

——陇右工委与甘肃工委的联络站，就设在渭源县的双轮磨，由杨友柏同志的岳父开设的一家客栈作为掩护，保证了上下联系的畅通，甘肃工委的重要指示能及时送到陇右地区。

——陇右工委的情报来源，主要靠渭源县供给。我们通过张静轩开的药房，订阅了国民党在兰州出版的报纸，从上面了解解放战争进行的情况和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

——陇右工委的地下印刷所，就设在渭源乡村，当时由这个印刷所油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毛泽东同志著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现在还发现有存稿。当时油印的不止这两种，我们记得还翻印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当时党中央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就发表在这个“宣言”上面。这些印刷品在向地下党员进行党的教育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陇右工委的地下活动经费，也主要靠渭源县的地下党员筹办。当时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来源，主要靠打土豪。但从土豪家中缴获的大烟土，不能直接拿出使用，必须先把它卖掉，变为现金。这项工作就由渭源城内的统战关系与莲峰

镇的地下党员负责，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保证活动经费没有发生大的困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后期（大约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的陇右工委会议，几乎全部在渭源境内的地下党员家中轮流召开，重大问题都在这些会议上作出决定。由于渭源的地方武装与地方政权全部或大部分掌握在陇右工委手中，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在渭源召开会议 的有利条件。

以上只是举出几个突出的事例，远远没有包括渭源地下工作的丰富内容。

三、由于陇右工委基本上掌握了渭源县的敌人的地方政权与地方武装，因此当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水的时候，陇右工委毅然决定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命令渭源自卫队的地下党员率领部队起义，和平解放了渭源县城，建立了由地下党员担任的渭源县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甘肃地下党解放的唯一县城，也是甘肃地下党建立的第一个人民政权。当时受到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习仲勋同志任政治委员的第一野战军的通报表扬。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渭源时，因受到沿途人民的热烈欢迎与大力支援，使解放军的指战员感觉到进入渭源境内，就象进入了“半老区”。

渭源地下工作之所以取得比较出色的成绩，这首先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特别是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分不开的。但是理论要变为现实，这就需要共产党员的坚决执行，否则再正确的理论也是一纸空文。渭源县的地下斗争之所以取得比较出色的成绩，这更与渭源全体地下党员的艰苦奋斗是分不开的。许多共产党员为坚决执行党交给他

们的任务，而献出了他们宝贵的一生，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这里我只举出两位已经过世的同志，他们的革命事迹，是值得歌颂的。

毛得功同志，渭源县××村人，因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压迫剥削，一九四三年参加了“甘南民变”，曾任王仲甲的第二路副司令。起义失败后，他和郭化如、杨友柏等同志转入地下，继续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武装斗争。一九四七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陇右工委委员，陇右人民游击队的司令员。他在创建陇右地下党、陇右游击队、陇右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是有很大贡献的。

夏尚忠同志，渭源××村人。一九四三年也参加了“甘南民变”。起义失败后与毛得功、郭化如、杨友柏等同志共同转入地下，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一九四七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任陇右人民游击队的第三副司令员。夏尚忠同志有一些缺点毛病，但大节还是好的，他在渭源建立地下党、建立游击队、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的贡献，是不能埋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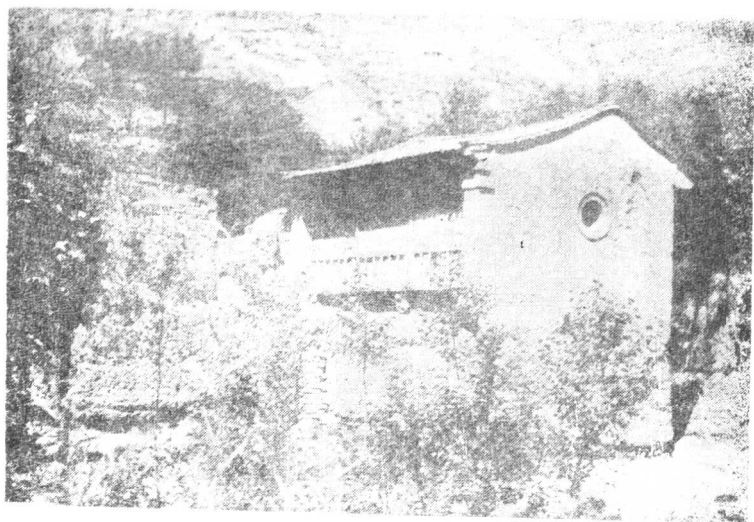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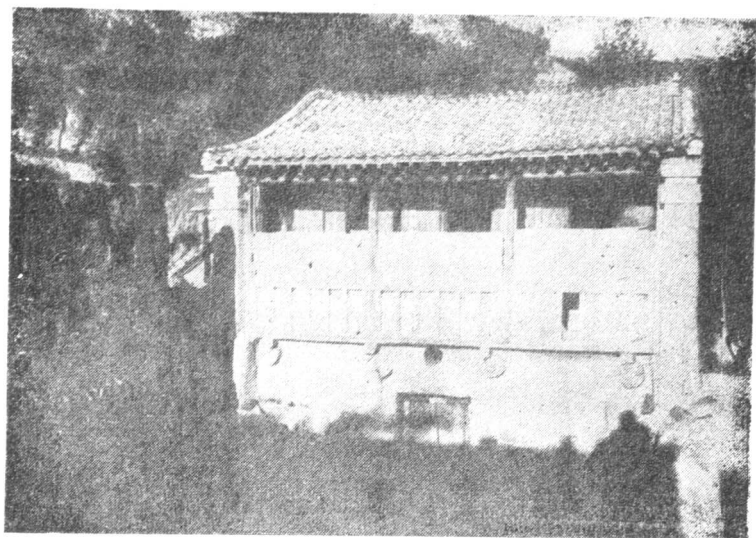
象毛得功、夏尚忠同样把宝贵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同志还有很多，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

渭源县的地下党员，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都是从渭源人民中生长出来的，都是渭源人民的好子女，渭源县的广大人民，正是生育这些好子女的母亲。

我们谨借此序言，作为棉薄的献礼，向伟大的渭源人民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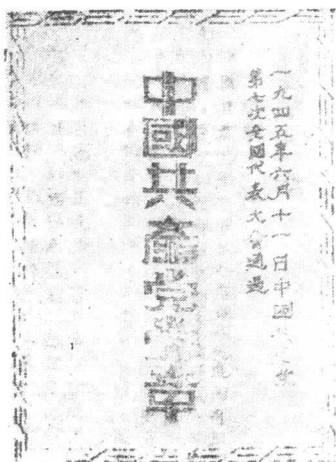
陈致中 牙含章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图为陇右工委地下临时印刷所遗址正、侧面照片

马宗华 摄



图为原地下党支部书记关正堂同志珍藏的地下临时印刷所油印的两份文件

撰写：费世昌

调查：王兴泰 万 义

张 珪 杨发祖

校对：郭建民 柳希茂

封面题字：张季纶

目 录

第一章 甘肃南部农民起义失败前后与党组织建立联	
系的经过	(1)
一、任谦在重庆晋见周恩来副主席	(1)
二、刘余生进边区	(3)
三、西北局、甘肃工委多次派人联系甘南农民起 义领导骨干，积极准备开辟陇右地区工作	(4)
第二章 甘南农民起义失败后毛得功、郭化如、杨友	
柏、夏尚忠领导的地下斗争	(8)
斩除两个便衣队	(9)
除掉特务邹风生	(10)
处死大恶霸“侯背锅”	(11)
第三章 陇右地下党的建立和发展	(13)
一、刘余生在陇右发展第一批党员	(13)
二、甘肃工委派干部开辟陇右地区党的工作	(13)
三、陇右地下党领导机构的建立和演变	(16)
第四章 陇右工委领导下的渭源（包括会川）地	
下斗争	(19)
一、地下党的组织发展和建设	(19)
（一）发展党员的对象、方法和手续	(19)
（二）地下党的组织发展状况	(20)

(三) 党员的教育.....	(24)
二、建立和发展“两面政权”	(27)
三、建立和发展“两面武装”	(35)
四、建立和发展反蒋统一战线.....	(41)
五、渭源地下斗争中的重要活动和事件.....	(45)
接肋巴佛来渭源参加地下斗争.....	(46)
工委联络站——赵家店.....	(48)
贾永寿被捕和处死老王婆.....	(50)
门楼寺夺枪.....	(52)
威震恶霸周歧芬.....	(54)
张集寨打土豪.....	(56)
营救王尚德.....	(58)
双轮磨巧脱险境.....	(61)
岗家岔突围.....	(63)
曹家川击退敌军追捕.....	(67)
吸收王兰坡入党.....	(69)
万良才盛家坪养伤.....	(72)
灵活机智，化险为夷.....	(73)
粉碎何世英清剿.....	(74)
郭家磨遭迁战与范理、刘登贤被捕.....	(76)
关正堂三进漳县城.....	(78)
建立地下临时印刷所.....	(79)
渭源城内特务受骗.....	(81)
处死危险分子浪国洲.....	(83)
牙舍章会川脱险.....	(84)
黄香沟营救王仲甲.....	(85)

粉碎敌人突袭盛家坪·····	(87)
刘家大路追歼溃敌·····	(89)
刘占华、周志毅会川起义·····	(90)
任竞成莲峰起义·····	(95)
渭源县自卫队起义·····	(97)
第五章 渭源、会川解放和建立人民政权 ·····	(100)
一、渭源和平解放和建立人民政权的经过·····	(100)
二、会川解放和建立人民政权的经过·····	(106)

第一章 甘肃南部农民起义

失败前后与党组织建立联系的经过

一、任谦在重庆晋见周恩来副主席

一九四一年，由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寇侵占了半个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当时在西安的国民党甘肃志愿兵团代理团长任谦和西安绥靖公署少将参议史鼎新，由于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斌臣等人的思想影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非常不满，于这年秋天毅然脱离国民党军队，返回会川、临洮家乡，联络各方有志之士，积极开展抗日反蒋斗争。

一九四二年农历九月十三日，任谦假借帮会“开山”的名义，在会川建立了“后续中华山民主堂”的组织，提出了“团结御侮”、“共同对敌”的口号，并确定由王占海搞武器，吴建威搞联络。为筹措活动经费，还组织了“安华生产合作社”。与此同时，史鼎新在临洮也联络了李如堂、王仲甲、肖焕章等一批人，并积极筹集经费，购买枪枝，准备发动农民起义。

不久，因“后续中华山民主堂”组织不严格，混入了国民党特务人员，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派便衣进行侦探。任谦察觉后，为躲避敌人暗算于十一月间潜往重庆。在重庆，任谦

经杨子恒和郭则沉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前身）。同时经朋友李西军多方活动，由国民党交通部委任为公路总局专员。任谦即以此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四三年初，在任谦、史鼎新的积极支持下，甘肃南部农民起义，在王仲甲、肖焕章、马福善等人领导下，首先从临洮爆发，随即扩展到甘肃南部十多个县，起义农民达十万之众，震撼着国民党在甘肃的统治。国民党当局除调集大批中央军和地方部队疯狂围剿外，还下令通缉任谦和王仲甲、马福善、肋巴佛、毛克让等农民起义领袖。任谦在重庆得悉后，给国民党甘肃省参议长张维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在重庆，“甘南事变与己无关”，使国民党当局陷入了被动。国民党甘肃省府主席谷正伦为邀买人心，扭转被动局面，命省保安副司令吉章简给任谦发电报，说“当局有事借重请即飞兰”。

正当任谦疑虑不定之际，杨子恒通知他，有位中共负责人要同他谈话，并告诉了时间、地点和联络暗号。四月十九日晚上，任谦来到离市区三十多华里的小龙坎一个人家里，意外地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会见时在座的还有徐冰、杨子恒、章伯钧。谈话中，任谦向周副主席汇报了甘南农民起义的情况，并请示他能不能回甘肃去。周副主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示任谦借此机会可以回甘肃暗中指导民变。同时，还就甘南农民起义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明确指示，说“根据当时形势来分析，甘南民变动手早了，有可能失败，应分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农民起义的行动口号应该是“改善役

政，改善粮政；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发国难财的；拥护抗战到底。”并且告诫说：“根据经验，帮会组织不能利用。”周副主席的教诲，使任谦如拨云雾见青天，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任谦回到兰州后，即派胡中新、张子玉二人分赴各地寻找农民起义领导骨干，传达周副主席指示。但因当时农民起义已经失败，敌人开始大规模清乡，领导骨干除被捕、牺牲的外大部分转入地下隐蔽起来，只找到少数人作了传达。同时，任谦又派刘忠到陇渭通知郭化如、杨友柏到兰州，亲自向他们传达了周副主席指示。

二、刘余生进边区

任谦从重庆回到兰州时，甘南农民起义已经失败，国民党正在大规模进行清乡，通缉领导骨干，捕杀起义农民，许多起义农民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任谦耳闻目睹这种凄惨景象，悲愤交集而又束手无策。为了掩护农民起义领导骨干，保存革命力量，他收藏了肖焕章、吴建威等人的枪支，并资助他们以小商贩作掩护暂时隐蔽起来。

不久，国民党委任任谦为酒泉保安副司令、第八战区参议。因酒泉离陕甘宁边区较远，难以和党组织进行联系，任谦遂以种种借口拖延未去到职。

一九四四年秋，任谦得知刘余生出狱后住在兰州，即找到刘余生商议决定，由刘余生去延安向党组织汇报甘南农民起义情况，并将烈士王德一的儿子王效忠及其同学谢成德一同带到边区去。为应付敌人盘问，顺利进入边区，任谦又以

“其弟任达”等要去榆林谋事为由，通过国民党晋陕绥边区司令部参谋长余方皋给刘余生三人办理了通行护照（自此，刘余生一直沿用“任达”作化名）。一九四五年农历正月十五，刘余生和王效忠、谢成德三人从兰州出发，经靖远、吴忠到达定边，进入了陕甘宁边区，并由定边专署介绍到了延安。在延安，刘余生一面参加学习，一面写材料向西北局汇报甘南农民起义情况。（因刘余生本人未参加甘南农民起义，他向西北局汇报的情况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同年十二月间，刘余生三人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余生等走后不久，国民党又任命任谦为平凉保安副司令。任谦到平凉后，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将肖焕章、吴建威、毛得功等几个农民起义领导骨干以各种名义安插隐蔽下来。接着，又将肖焕章、毛得功的家属分别安置在平凉的柳湖和隆德县居住。有时还在经济上予以接济。

三、西北局、甘肃工委多次派人联系 甘南农民起义领导骨干，积 极准备开辟陇右地区工作

西北局领导同志从刘余生的汇报中了解到甘南农民起义被国民党镇压下去了，不少起义农民牺牲在战场上和敌人的刑场上，这就在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和亲友中埋下了对敌人的血海深仇。而且有一部分起义骨干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仍在坚持着地下隐蔽斗争，说明这个地区群众斗争的基础是非常好的，从而在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重视。

一九四六年初，党中央根据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党的“七大”确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路线，批准恢复了甘肃工委。西北局、甘肃工委为全面开展甘肃党的工作，一方面派干部到甘肃各地恢复、整顿原有党的组织，一面利用各种线索积极寻找甘南农民起义幸存的领导骨干，准备开辟陇右地区工作。

一九四五年底，西北局先派王效忠到平凉与任谦进行联系。王效忠到平凉即转告任谦，党已决定开辟陇右地区工作。

一九四六年六月，西北局派罗扬实按照刘余生提供的线索，到甘肃南部地区寻找幸存的农民起义领导骨干，准备筹建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但因刘余生与转入地下的甘南农民起义领导骨干毫无联系，所谈情况不实，所以罗扬实化装成小商贩，走遍了甘谷、武山、陇西、渭源、临洮一带，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于九月间经兰州返回延安。

一九四六年八月，为了迎接中原突围部队顺利进入陕北并乘机扩大边区和开辟陇南地区工作，西北局、甘肃工委组织了华平、海固、陇南三个工委及所属武装大队和干部队。海固（工委书记兼政委陈致中，武装大队司令马思义，干部队队长赵崇德）和陇南（孙作宾兼工委书记、政委），副书记兼副政委惠庆琪，武装大队司令刘余生，副司令马富吉；干部队队长高健君）两个工委及所属武装大队和干部队从陕甘宁边区出发，由固原、西吉、海原、隆德等地向西主动出击。不久，因中原部队顺利进入陕北和平凉老龙潭战斗失利，遂撤回陕甘宁边区。